

海南大学图书馆馆藏(明)崇祯刻本《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首一卷》为丘濬后裔丘程光先生捐赠。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 H 观察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不久前,琼籍徽学专家叶显恩教授将8000册家藏图书全部捐赠给海南大学图书馆。6月10日,海南名中医霍列五后人将部分家传典籍,捐献给海南省图书馆。

“书藏于私,不如藏于公。”向公共图书馆捐赠图书,早已是有识之士的一种优良传统。

1984年起,美籍华人林汉生教授不辞辛苦,在美国发起为海大捐献图书的活动,征集到了1.8万册原版外文书籍给海大,价值50万美元;

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至今保存着海南著名侨领郭云龙、郭巨川、郭镜川父子家藏的珍贵图书273种总共1656册,以及知名人士石光瑛先生捐赠的208种1257册古籍;

海南省图书馆建馆伊始,开馆当日的30万册藏书中,约有一半来源于社会各方捐赠。

回顾海南省图书馆、海南大学图书馆、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图书馆馆藏起步阶段,馆里的图书大多数来自社会捐赠,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捐赠,就没有图书馆”。



金春明、李振霞夫妇累计为海南捐赠图书近7000册。



叶显恩教授(右)将八千余册藏书无偿捐献给海南大学。

## ◆ 学者一直是图书捐赠的主力军

从海南大学图书馆提供的近十年的捐赠数据来看,除了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学者、作家等文字工作者一直是图书捐赠的主力军,他们有时会选择捐赠自己的著书,有时则会捐出部分藏书,数量多则几百上千本,少则几本几十本。

海南省图书馆也会每月定期公布上月的图书捐赠情况,在其官网公开的数据中,捐赠情况一目了然,除了团体捐赠,大多数私人捐赠都以零星的散户为主,像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李振霞伉俪累计向海南大学、海口经济学院捐赠图书近7000册,叶显恩教授捐赠8000册图书的情况,

其实在私人捐赠中并不常见。

“学者比较喜欢向大学捐赠图书,大学也很欢迎学者捐赠,因为他们的藏书多是用于研究的专业书籍,且会有部分手稿,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据海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闫金玲介绍,不少教授退休前,都会选择向大学捐赠图书,数量多有少,像海大教授王春煜就曾向海大图书馆捐赠过500余册图书。

“参加赠书仪式,有点像家长参加子女婚礼。”金春明、李振霞夫妇用“嫁女儿”来比喻“捐赠图书”。对学者来说,终日与书为伴,藏书凝聚了他们一辈子的心血,等老了的时

候,捐给图书馆可以使更多的人受益,他们“一方面为女儿找到如意郎君、合适人家而高兴;同时,又为养育多年的心爱女儿从此远离家门,而有点依依难舍之情。”

“学者把著作、藏书捐给图书馆,不是为了图书馆能给他们什么回馈,而是为了自己的思想、作品可以流传下来,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敬畏之心对待捐赠人,好好善待他们的作品。”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陈平殿感慨道。如他所言,一些学者、作家专著作品出版后,会主动跟图书馆联系,寄数本给不同的图书馆收藏,以让更多读者可以阅读他们的作品。

## ◆ 没有捐赠,就没有图书馆

恩教授捐赠的8000册书籍来看:其中有2000余册线装古籍,多为地方史学、海南学、经济学研究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非常完整,研究价值高。

《四部从刊》《金瓶梅》《康熙字典》等珍贵古籍也在捐赠之列,仅《康熙字典》就有几个版本,还有海南大学没有的四库全书版本。叶显恩教授捐献的线装书《金瓶梅》,上世纪50年代新华书店在全国仅有500本,可谓“一书难求”,恰有好友相赠,叶显恩教授将此书珍藏至

今。”闫金玲去广州数日,才将捐赠书籍悉数运回。

“灰色文献”是许多大学图书馆非常看重的馆藏,而这些基本全靠捐赠。”陈平殿所说的“灰色文献”,是指诸如家谱之类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他认为,作为地方高校,海师图书馆一直将整理地方文献资料视为其义不容辞的责任,甚至还专门建立了海南文献室。

海南文献室中有海南各地区方志、文史资料及历代琼籍人士著述的诗、文、杂记等,除了广东省立图书馆

和台湾国立图书馆外,该馆在收藏海南地方古籍文献方面名气颇大,满足了特定读者群的特殊需要。“这些宝贵的图书绝大部分为当时的热爱海南文化教育的人士所赠,没有他们的无私支持,便没有我们今天可以称得上是丰富的馆藏。”陈平殿说。

“书藏于私,不如藏于公。”在许多图书馆工作人员看来,公共图书馆有更专业的图书管理人才,能够更善待这些珍贵资料,使之发挥出应有的价值,让珍贵典籍回归图书馆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 ◆ 引导公众捐赠方向,让图书捐赠物尽其用

6月10日,“辅政堂”二代传人霍毅和三代传人霍筱薇将部分家传典籍捐献给海南省图书馆。海南名中医霍列五一生收藏了大量的中医典籍,“辅政堂”藏书鼎盛时期多达十万卷,此次上百卷的捐赠中包括中医古籍暨民国文献29部30册,解放初期期刊2种5册。捐献藏书中,《鼠疫汇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鼠疫专著,既是中医古籍,又是珍贵的海南文献。

每家图书馆都有各自收藏使命与特定藏书取向,比如高校图书馆的藏书就偏重于学术性与专业性,将过于通俗的读物捐赠给高校,虽然心意

难得,但并不能使捐赠的图书利用率更高。其实,比起省图书馆、海大图书馆、海师图书馆,一些私人图书馆、社区图书馆更需要大众的支持。

一方面,像海南省图书馆的基础设施藏已趋近饱和,爱心读者、各大出版社、基金会等社会团体仍捐赠不断。但另一方面,一些小型的社区图书馆因经费紧张、捐赠源过少,导致他们藏书匮乏,运营发展艰难。“我们想在海南贫困地区建立图书馆,但个人的力量很微薄,发出的

声音也很微弱,不知道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诉求、凝聚起大家的爱心。”爱心人士富荣校有意建立图书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却苦于捐赠源有限。

因此,相关人士建言:与其“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想各种办法利用饱含的捐赠图书,不如完善图书捐赠机制,让各大图书馆明确职能与受赠范围,引导民众的捐赠方向,让不同的图书馆各司其职,让小型私立图书馆也能享受到图书捐赠的红利。



民族歌剧《红色娘子军》剧照。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 民族歌剧《红色娘子军》主创王艳梅谈创作历程: 六年苦旅 再塑红色经典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一个情结、一个梦想的力量有多大?

6月14日、15日晚,由中央歌剧院、海南省委宣传部和海南省文联联合出品的民族歌剧《红色娘子军》唱响国家大剧院舞台。4000余名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让该剧最深的创作者——省文联专职副主席、音乐家王艳梅感受到了圆梦的喜悦。回忆创作历程,王艳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歌剧《红色娘子军》是一场创作的苦旅。”

“这部作品亮相国家大剧院,无疑是一个最美好的抵达,然而这条路实在太艰苦而漫长了,从最初的起步算起我们整整走了六年。”王艳梅说:“一个重大文艺项目如果源于上层的规划设计,无疑先天营养充沛,必定得以健康迅速成长;但若只源于你的一闪念和愿望,源于你心底萌发的一个梦想,事情就不那么轻而易举了。”

童年时,操场上放映的电影《红色娘子军》让王艳梅记住了这支勇敢的娘子军队伍,同时让她知道了海南岛,主题曲的旋律更是从此印在了心间。

“若干年后我来到海南,听说了更多关于那段艰苦岁月的动人故事,被这一切深深打动,可起初并不知道自己要为此做点什么,只是不断地写出关于凭吊、缅怀与追寻那段时光的歌曲,例如《找寻当年》《永远的丰碑》等。”

2010年末,王艳梅在长沙观看了红色经典歌剧《江姐》。在返回海南的飞机上,这位曾写出海南音乐名片——歌曲《永远的邀请》,并一直在围绕“海南”创作的音乐家忽然感到心底的那个梦变得愈发清晰。

“一回到海南,我就投入了歌剧《红色娘子军》的剧本改编和部分场次的音乐创作工作。没有经费支持,又要想听效果,只好将完成的部分场次唱段作为音乐会节目先后排入2011年底及2013年底举办的海南文艺界新年音乐会的演奏曲目中。”

随之而来的观众好评与媒体关注让王艳梅坚定了无论如何也要在这条创作路上走下去的决心。2014年,她

在一次会议上借机谈起了这部歌剧

作所面临的困境,也由此得到了文化企业的支持。

“当时钱不多,但足以启动这部剧的创作。”她说。在时任省文联主席张萍支持下,该歌剧创作得以正式立项,并组建了由国内优秀词曲家朱嘉禾、王持久、陈道斌等人组成的主创班底。

2014年6月,主创人员深入琼海、定安、琼中等地,走访故人故地搜集考察史料,了解琼崖革命战争中发生的历史史实。“不少真实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将其进行了改编,融入了歌剧。”

2014年12月底,王艳梅和作曲家朱嘉禾深入到海南腹地琼中黎族村落采集中当地音乐素材。

“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全村人聚集在村里的土坡上烧锅煮饭摆酒招待我们,村民们端起盛满山兰酒的酒碗就开唱,兴致越高,山歌越唱越多。通过这次环岛采风,我们采集了大量的海南民族民间音乐素材,从中挑选提炼人物音乐,设计场景音乐,对剧本唱词反复斟酌修改。”

中央歌剧院邀请著名剧作家欧阳逸凡担任文学指导,组织原主创班底对剧本做进一步修改打磨。“精益求精

让故事更曲折、旋律更优美,同时,让海南元素更突出。”

省委宣传部的支持,省文联的推动,项目合作终于结出硕果。王艳梅说,作为主创班底中的海南代表,她一直在努力让这部红色经典彰显海南风采,传播海南文化。

“我很自豪也很感激我生活、深爱的这片土地上创下了‘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光辉历程,造就了这样一支传奇的娘子军。希望自己的能为它写下更多讲述海南故事的旋律。”王艳梅说。

## H 评弹

## 寻找传统文化的“打开方式”

让龙袍亮起来、让建筑动起来、让瓷母时尚起来……在刚刚过去的“中国自然与文化遗产日”,北京故宫博物院以一系列有趣有料的活动,吸引了不少人走进传统文化、走进艺术现场。

在很多网友眼里,故宫是个神奇的存在,常引来感叹:“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故宫!”它既是“感觉自己萌萌哒”的雍正皇帝表情包,也是纪录片里技艺精湛自得其乐的大国工匠,当然,它还是那个历经600年风雨的明清两朝紫禁城、年客流量1600万的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故宫也曾在公众面前遭遇尴尬,如今却能华丽转身,在互联网上主打造物之美,兼顾攻略之实,还时不时跟256万微博粉丝互动卖萌,你来我往好不从容。

社交媒体的经营,绝不仅仅是“公关”。通过互联网,故宫不仅赢得了面子,更重建了公共博物馆与公众的具体关联。环顾四周,一些博物馆给人的印象是陈列呆板、讲解套路化,缺乏互动,于是恶性循环,愈显门前冷落鞍马稀。加上服务意识欠缺、管理水平不足,使得那些博物馆脱离了跟公众生活的联系。这样的难受劲,故宫也不是完全没有体会过。

一旦接通互联网,绑定了活生生的粉丝,就再难“目中无人”了。也正是从接通社交媒体、虚心面向公众的那一刻起,人们逐渐看到了故宫越来越凌厉的攻势:博物院开放面积比例从2012年的48%一跃为2016年的76%,接连推出了虚拟现实体验、数字化微信平台、“韩熙载夜宴图”“每日故宫”等多款手机应用……多层次、多渠道地有效面向公众,人们发现,故宫找到了传统文化的“正确打开方式”。

这个“正确打开方式”不只是与公众简单互动,而是让传统文化与公众的日常生活变“黏稠”。在更多层次的共享中,传统文化的形态实现了丰富和再造,故宫已经不再只是那个北京城中轴线上72万平方米的皇家院子,它在云端,在数字博物馆里,在创意用品中,更为重要的是,它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从皇家私藏到国家所有,再到多层次、多渠道的社会共享,在故宫文物面前,人与物的关系也发生了分明的进化,早已不再是“天下至宝,尽归帝王家”,而更加接近共有共享的理想。

其实,传统文化就像一个生命体,只有跟人建立了紧密的共生关系,才能不断进化。

那些古代典籍、历史文物,不只与古人有关,更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有关。从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引发年轻人追捧,到“石渠宝笈特展”成为舆论热点,都说明传统文化在与现代人共生共长的过程中,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故宫的成功转型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更是心灵的、文化的,它说明只要融入现代人蒸腾的生活,传统文化就能再发新芽。

(据《人民日报》)

## 日本动画师 生存状况引关注

近日,日本知名动画工作室吉卜力的一系列动作引发了业界关注。先是7次退隐又宣布复出的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再次宣布复出,将携手制作人铃木敏夫共同完成长篇新作;再是吉卜力工作室宣布基于《天空之城》《千与千寻》《龙猫》等经典动画打造吉卜力主题公园。然而,宫崎骏或许没有想到,这一系列大动作却被一则招聘广告给风头。

宫崎骏在2013年制作完成《起风了》之后宣布退隐,并解散了吉卜力动画制作部门。现在为了制作新的长篇动画,又不得不重新招兵买马,招聘电影动画师。在吉卜力发出的略显冗长的招聘广告中,对工作岗位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包括工作地点、任职要求等,同时强调不限国籍,只要精通日语,便可提交应聘申请。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业界关注吉卜力启用新电影动画师制作新作将面临诸多困难时,社交媒体上不少外国人却被月薪20万日元(约合1797美元)的细节震惊。有网友评论称,自己也是动画师,这样的薪资待遇让他难以接受;还有人称,东京生活成本很高,吉卜力作为大企业给出这样的薪资待遇让人寒心……然而,对于这一薪酬,日本网友则显得非常平静——“事实上,20万日元的月薪已经比很多日本其他动画公司要高很多了。”

据报道,以动画产业扬名世界的日本,有着许多凭借自己对动画的热情积极从事创作工作的艺术家,正是他们撑起了日本动画产业,然而,他们的才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收入微薄。皮克斯动画设计师格兰特·亚历山大也曾对日本动画同行表示同情,称日本同行的工作环境实在太残酷了。他们除了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社会活动,就像与社会切断了联系。

(据《中国文化报》)



关注  
文化  
周刊